

WO CHANG GUO DE GE

我唱过的歌

延泽民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唱过的歌

延泽民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北京

(京)新登字140号

我唱过的歌

延泽民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字数135,000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039—0024—5/I·19

定价: 3.40元

我唱过的歌

——代序

我不会唱歌，又偏爱唱歌。

不过我不是用歌喉，而是用一支笨拙的笔，唱心中的歌，抒发我内心想赞美的东西——和平、友谊、劳动、自由、幸福的生活，赞美那些为了这一切而斗争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不论通过歌喉或者笔端抒发出的声音，都是内心感情的表露，而不是“无病呻吟”，是有感而发，应当是真实的。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作品，都是我真诚地赞美过的东西，因此我管它题名为《我唱过的歌》。

然而，当我编完这个集子要送交出版社的时候，我踌躇了。我象一个怯台的演员要上场一样，心绪惴惴，犹豫了许久。

我发现，我曾经亲身感受到和亲眼看见过的动人情景，有的在后来消失了；我曾经尽情讴歌过的美好事物，有的在后来变丑了！

我举两个例子。

五十年代，我把列宁缔造的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尊敬地称之为“老大哥”。我向往它，羡慕它。我衷心祝愿苏联人民幸福，祝愿中苏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我怀着这种友好的感情，从顿河到伏尔加河；从斯大林格勒到列宁格勒；从波罗的海湾到黑海之滨；从格鲁吉亚到阿美尼亚，游览了许多风景名胜，访问过不少作家、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以及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所到之处，感受最深的是苏联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希望和平生活，希望友谊。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把我的所见所闻，融汇于我的感情之中，写下了近十万字的游记。我回国之后，以《访苏散记》这个总题目，计划在《北方文学》上陆续发表。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在中苏关系上发生了人所共知的变化。我无法克制心头的愤怒，将未发表的《散记》扔掉，便投身到克服当时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了。十年动乱中，我被关进“牛棚”，没有人身自由，当然也无什么赞歌可唱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踏上的第一个风景区，就是我曾经游览过的镜泊湖。我过去也唱过赞美它的歌。啊，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的浩劫，美丽的镜泊湖竟象遭受了一场战争那样，变得遍体鳞伤！原来北湖头有一个水力发电厂，有人又在湖底挖了一个洞，名曰“地下发电厂”。结果，北湖头的大水坝枯竭了，一望无际的碧水大湖变成一片荒芜的沙舟。湖底的礁石灰

溜溜地裸露在蓝天之下，石缝里挣扎着伸出脑袋的野草，哆哆嗦嗦，仿佛在抽泣。几十万尾鱼枯死了，可谓“竭泽而渔”的创举！呜呼哀哉，悲矣哉！

我怀着昔日的记忆，翻阅过去记录下的这些文字，拿不定主意了。它可以收进这个集子里吗？美国人有一句格言：“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中国也有一句格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意思都说的是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而辩证法的一个核心，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都在发展。于是我这才从迷离中拿定了主意，把这些文字也放进这个集子。

文学是历史生活的记录。它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生活，融汇于作家的真实感情。我喜欢唱赞歌，不喜欢唱悲歌。即使对于亡友、先辈的缅怀，也是赞美；赞美他们高尚的情操、美德，赞美他们一切闪光的业绩。

一切丑恶的东西应当受到诅咒，一切美好的东西应当受到赞美。这，就是我想唱的歌，过去如此，今后也愿以此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

作 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于北京

目 录

我唱过的歌

——代序 (1)

让春天常在

——为《文艺百家》创刊而作..... (1)

在宝塔山上..... (4)

从牡丹江到镜泊湖..... (8)

呼兰河畔的旭光..... (19)

张二叔的南瓜..... (23)

从一个山庄想到万千个山庄..... (33)

《陕北民歌艺术初探》序言..... (40)

孩子和他的一家人..... (45)

高满仓..... (50)

十斤娃三气赖蛤蟆..... (55)

追念我的第一个文学导师柯仲平同志..... (63)

怀念茅公..... (76)

同茅公在一起的日子..... (83)

茅盾和我的《红格丹丹的桃花岭》..... (89)

悼念李季同志	(93)
怀念	(100)
文明、节奏和生命	(105)
沉重的纪念	(109)
控告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记信川博物馆	(113)
革命的英雄主义万岁	(123)
朝鲜女教师金一琬和她的学生	(144)
从北京到莫斯科 ——飞行杂感	(153)
我的一支心歌	(160)
拉兹里夫升起的火炬 ——记列宁避难处	(165)
什么叫做对祖国的忠诚和勇敢 ——访斯大林格勒战斗英雄伊万·菲波维奇	(169)
英雄的城市，美丽的花园 ——斯大林格勒漫记	(180)
塔雅和丽达	(193)
在苏维埃阿美尼亚	(199)
记忆，在今天鲜活 ——回忆我在延安鲁师的三进三出	(210)

让春天常在

——为《文艺百家》创刊而作

粉碎“四人帮”，文艺的春天来到了。

祖国大地，回到了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的心上。

被摧残的鲜花，重新挺直腰肢，绽开笑脸，散发出馥郁的芳香。

被打入地狱的芳草，重新见了太阳，焕发了无限生机，欣欣向荣。

被禁止生存的花种，冲破土坷垃，茁壮成长。

人民为它欢呼，人民为它歌唱。

可是那些被“四人帮”的催泪瓦斯迷住了眼睛的人却战栗了。

——不得了！不得了！

——何事惊慌？

——放过头了！放过头了！

——是么？！

——你看，那些花种并不是“最最最”美的，味道也不是“最最最”香的！何况，说不定那一类花种里还含着毒液，蔓延到“天尽头”，腐蚀坏“擎天柱”，天

塌下来怎么办？怎么办！

唉呀呀，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这是“无影”邪笔么？不！

君不见：

“四人帮”的“帽子工厂”吐残烟，“钢铁工厂”有废铁！

你瞧：一篇“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作品里，塑造了一个“四人帮”干将的艺术形象，竟有人用“四人帮”的“影射文艺”、“阴谋文艺”的帽子，从暗地扣来！

你听：当三中全会的精神光芒四射，祖国大地一片欢腾的时候，却有那么几个人，摇着脑袋，嘴里念念有词，说：“右了！”，“右了！”他们俨然而傲然地以“高举派”、“凡是派”自居，要“纠”或反三中全会的“右”了！

是的，这是几多人，少数人；而且不都是坏人，恐怕多半是思想僵化所致。但我以为不得不提醒人们注意：当年的“四人帮”一伙，就是靠这一套极左的面貌欺骗人、迷惑人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岂能等闲视之！

《文艺百家》创刊，要我写几句话。我想我们要以敏锐的目光，继续清除“四人帮”这股污水在文艺领域留下的垃圾余臭，为发展祖国的文艺事业扫清道路；我们要充分发扬文艺民主，在广阔的文艺领域里，在文艺

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自由地讨论，热烈地争鸣；我们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迎着三中全会霞光照耀的目标，继续展开理想的翅膀，向前翱翔。

生活的良师，实践的历程告知我们：在前进的征途上，常常会遇到阴风鬼雨，恶浪暗礁。道路不可能永远平坦，航船不可能永远顺风。如是，怎么办？越过它，继续前进，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的文艺园丁更辛勤地劳作，让文艺花园的百花永远盛开！

（原载《文艺百家》创刊号1980年第1期）

在宝塔山上

延安，是名满中外的革命圣地，又是我的故乡。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念着它，最近终于有机会又回去住了几天。

延安的同志告诉我，许多老同志到延安后，都要看看自己曾住过的窑洞。并且还要在窑洞门前照一张相片带回去。我不但想看住过的窑洞，还想看当年打柴、割草、拦羊、放牛、开荒种地，以及同敌人周旋、打仗的地方。

登上宝塔山，延安全景便一览无余了。从前上宝塔山，只有几条羊肠小道，有的坡度很陡，爬上去不免要出一身热汗。现在修了盘山公路，从城里坐汽车不到十分钟就上去了。在宝塔坐落处，战争年月那种荒芜杂乱的景象早已一扫而尽，变成了松柏长青、整洁、优美的高山公园。我从那里的松柏树下竖立的碑牌上，看见从中央领导同志到部队、机关、学校、外省市以及大工矿企业栽种的许多树木，有的已经长高了，枝叶丰茂，挺拔葱翠。陕北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告诉我：“古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今是今人栽树，今天就能乘凉了。医生说我有心脏病，让我睡在炕上休息。我睡不

定，就爬宝塔山。我每天步行上山，坐在松树下，一面呼吸新鲜空气，一面编新书。没过半年，心脏病就好了，身体也更硬实了。”我握住韩起祥的手臂摇动了几下，哈，不假，很壮实。宝塔山不仅是一个休息、游玩的好去处，而且还是一个写书作画的好地方哩。怪不得山上盖起一幢幢小房子，有吃有喝有桌椅板凳，设计师们可真想得周到啊！

凤凰山、清凉山，原来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岭，太阳一照，红光满面。山畔上长几撮柠条和小榆树，远远望去，仿佛稀稀拉拉的老山羊胡子。一九四七年敌人占领延安后，连这些“胡子”也拔得精光，拿去修垫了战壕。现在这山上的树木虽然还不多，但正在绿化之中。有些山坡上早种的树已经长大了。你如果在炎夏爬这两座山，不必仰望流云蔽日，随时都可以找到大树乘凉的。古话说，“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在承包造林政策的鼓舞下，可以设想，再用不了十年，这里就能够变成满目青山的。从山上望下去，当年山坡上那些高高低低的土窑洞，一九四八年敌人溃逃时烧掉的大部分门窗，延安人民便用石头砌口，叫做“接口石窑”，比原来更坚固，不怕雨打，也不怕火烧。今天，机关团体和许多居民，又重新盖起了一排排的崭新石窑。站在宝塔山望去，圆溜溜的窑口，天蓝色的或朱红色的门扇，亮光闪闪的窗户，实在好看。延安城垣，一九三八年被敌人飞机轰炸之后那种一片瓦砾的凄惨痕迹完全见不到

了。从城里到南关，以至七里铺，包括当年为了预防飞机轰炸而开辟的新市场口沟，都是楼房林立，数也数不清了。

在雨季，容易暴怒的延水河，现在已变成清澈见底的溪流。过去，上游下了暴雨，下游就发洪水，那洪水可真称得上是汹涌澎湃，一泻千丈，实在怕人得很。洪峰冲到宝塔山下，碰到石崖的阻挡，猛地飞起扑天的浪花，忿怒地哇哇大吼着向府南川涌去。如果府南川也有洪流冲出，两个浪头一碰，就象两条互不相让的蛟龙，先是腾空而起，然后降落下来，又一起咆哮着去吞噬古城。这时只有胸怀宽阔的府东大川，张开双臂让它倾泻，这才能保住城垣。住在山坡上土窑洞里的人们，虽然能观看这波涛壮景，但总不免要提心吊胆，为古城的安危犯忧。今天不怕了。在延河上游，距离延安四十公里的安塞县王家窑，筑起一个巨大的拦河坝，水库能够容纳整个延河水，也足以承受上游的洪流，还能养鱼、发电、灌溉农田。

今天，除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仍保持着当年的面貌，供人参观外，别的地方都变了，连山山洼洼，沟沟岔岔也变了，变新了，变得更好看了。当然比之沿海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延安、陕北还差得很远。

我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又爬上宝塔山凝望许久。夕阳从凤凰山一个凹下去的豁口射出金色的光芒，恰好和宝塔形成一条直线，远山那些叠叠层层的背坡沟洼，

已变成紫褐色的一抹，而宝塔却象涂了金粉一般绚丽闪亮。西山的身影跨过延水河，贴近这金灿灿的宝塔，而整个延安河山，仿佛无与伦比的巨大画卷，美极了。太阳落山之后，远远近近的山沟、村庄的窑洞里透出的都是明洁的电灯亮光。

（原载1985年3月7日《人民日报》）

从牡丹江到镜泊湖

镜泊湖啊，镜泊湖，日内瓦湖愿和你交朋友，西湖愿跟你手拉手。——这是游览过日内瓦风光和观赏过西湖美景的人，到了镜泊湖之后唱起的赞歌。

茅盾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郭小川同志陪同下，原拟在视察哈尔滨之后，就到延边去。但因从哈尔滨到延边，中间必须经过牡丹江市和宁安县，而镜泊湖就在宁安县境内，所以我们都希望他在路过时能够趁便去看一看。茅盾同志经过一番考虑，终于在我们的鼓动下同意了。

我们于十九日晚十时搭火车从哈尔滨出发，第二天上午九时就到了牡丹江市。由于我们都没有到过镜泊湖，牡丹江地委特地派关慈同志为我们做向导。关慈同志是宁安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联游击队，足迹踏遍了镜泊湖两岸山野的大小丛林，对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解放后，他当过宁安县长，现在是牡丹江森林经营局的副局长。我们在他的陪伴下，当天下午就离开牡丹江市向南进发。

渤海王国故址

汽车走了128华里，三度跨过牡丹江后，就到达宁安县第一大镇东京城。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渤海王国”（又名“震国”）的故都。据史书记载：古时这一带有一个叫“靺鞨”的民族，其中一部族称“粟末靺鞨”。公元七世纪末，粟末首领大祚荣统一粟末，并征服临近一些部族，建立了震国，自称震国王。公元七百一十三年，被唐朝封为渤海郡王，成为唐帝国极北边疆的一个属国。至公元八百二十六年，才被契丹族首领耶律忆阿保机征服，更名为“东丹国”，变成辽的属国。

渤海王国的皇宫设在牡丹江的右岸，即现在东京城市镇的西北郊区，其遗址现仍可辨。全部宫廷共有五排大殿，每排大殿相距约百十米，其规模之大，不亚北京故宫。最前面的宫殿叫“五风楼”，殿基建在一个人工堆积起来的数十米高的小丘上，周围用火成岩石块砌成。进了“五风楼”，向右前方走数十步是“八宝琉璃井”，井深约两丈左右，直径不过二市尺，可能当时宫廷里的用水都取于此。现在井水尚能饮用，井旁草棚里看守菜圃的农业社社员们，饮用的就是这个“八宝琉璃井”的水。他们对于渤海王国的故事，知道的很多，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了几个，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几个故事的大意，都说的是几对恋人为了争取爱情自